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作者：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本研究选题重要、设计合理、逻辑严谨、写作规范，基本符合学报发表标准，但是存在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或者细节问题。具体如下：

意见 1：题目为中国人的理想情绪，但是研究一的样本太少。

回应：

非常谢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的确，从表面上看，研究 1 的样本确实看起来不大。这主要是我们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因为从统计上和研究的问题而言，研究 1 的样本其实合乎要求的。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研究 1 的样本确定进行应有的描述。即“*由于没有研究直接探究理想积极情绪的变迁，无法确定理想情绪变迁的效应量。根据大多数心理研究所得中或低等的效应量这一结果(Meyer et al., 2001)，我们在本研究中预期得到中等强度的效应量。我们事先使用 G*Power 软件进行过统计效力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时，获得中等效应量 $f = 0.25$ ，需要 80% 统计检验力的最少样本为 55(Faul et al., 2007)。在本研究中，我们最终收集了 84 名被试。其中女性被试 45 人，男性被试 39 人；年龄范围为 49 至 91 岁，平均年龄 62.64 岁，标准差为 8.93 岁。被试的年龄段可以确保每一位被试在 1980 年时至少已经 10 岁，对中国从 1980 年至今的发展历程有切身经历。*”可见，由于我们采用的是被试内设计，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研究 1 的样本量是符合要求的。此外，研究 1 采用的是主体间的视角进行研究，测量的不是被试本身的心理特点，而是知觉到的特定时代所有中国人的特点，鉴于群体差异一般要小于个体差异，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样本量的要求一般也比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要小。总之，研究 1 的样本看上去较小，但实际上是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

意见 2：研究二和研究三都是学生，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太低，泛化为中国人的理想情绪太过牵强。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表面上看，我们研究 2 和研究 3 用的是学生样本，学生样本似乎不能代表中国人。但是，研究 2 探讨的不是学生本身的理想情绪，而是他们知觉到的三代中国人的差异，因此探讨的实际是中国人的理想情绪的代际差异。研究 3 用的是学生样本，确实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体中国人，但是我们的样本很大，并且最后的结论不是单纯依据研究 3 做出的，而是综合三个方法完全不同的一致性结果做出的。具体地，研究 1 和 2 采用的都是主体间的视角，探讨的都是知觉到的全体中国人（研究 1）或不同代的中国人（研究 2）的理想情绪，研究 3 是主体内视角。总起来，三个研究有主体间的视角（直接探讨中国人）、主体内的视角，有学生样本、非学生样本，虽然各有局限，但是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可以说整体上本系列研究探讨的是中国人的理想情绪。

此外，已有的关于理想情绪的大部分经典研究（如 Tsai et al., 2006; Tsai, 2021）都是

以大学生为被试的，但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没有一个说是仅限于大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样本的局限不是本文独有的，而是该领域甚至是很多心理学领域共有的。尽管如此，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在文中进行了部分修改，特别是指出了大学生样本的局限性。

意见 3：引言和结论都未充分阐述和解释，为什么预期改革开放以来，高、中、低的理想情绪都呈上升趋势。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在研究假设的提出方面确实存在不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专家可能没有留意，我们没有预期“改革开放以来，高、中、低的理想情绪都呈上升趋势”。我们原来的预期是：高唤醒的积极理想情绪上升，低唤醒的理想情绪下降，而一般积极理想情绪上升。

结合其他审稿人的意见，我们对三种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预期进行了仔细的考虑，基于现有文献，我们对原来的预期进行了调整，并依据新的逻辑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以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假设背后的原因。改写后的假设如下：

“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而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如 Tsai et al., 2006)；而对于一般积极理想情绪，两种文化下的个体则不存在偏好差异(Tsai et al., 2016; Tsai et al., 2006; Tsai, Miao et al., 2007)。迄今为止，已经有大量研究探讨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心理转型，其中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个人主义在不断上升，集体主义在不断式微(Cai et al., 2018; Ma et al., 2016; Yu et al., 2016; Zeng & Greenfield, 2015; Zhang; 2013)。据此，我们推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在不断上升，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则在不断下降，而对积极情绪的偏好则没有变化”。

根据新的假设，我们对文章其他部分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 4：高唤醒和低唤醒共生并存的解释很有意思，但是较为肤浅，是否能从辩证思维的理论进行剖析或者挖掘其他类似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进行阐述？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变迁不应数据驱动，而应理论驱动并推导出理论假设，加以实证数据的佐证。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非常宝贵的意见。首先，我们非常认同“**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变迁不应数据驱动，而应理论驱动并推导出理论假设，加以实证数据的佐证**”。我们目前的研究其实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不过，我们在提出假设和预期时，主要是以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发现的文化和理想情绪的关系的主要发现为基础进行推论，然后开展三个研究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了一些和预期不一致的结果。

我们的发现确实可以用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进行解释，比如朴素辩证主义理论。在修改稿中，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基于朴素辩证主义理论的解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运用朴素辩证主义理论进行解释时，我们没有进行过多的展开和深入，因为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且到目前为止该理论极少用来解释变迁现象，深入探讨需要专文。我们计划等有更多的符合辩证思维理论的变迁研究证据后，专文来深入讨论如何用这两种理论来理解变迁以及其他大量在西方看来似乎矛盾的中国现象。

意见 5：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关注和渴望在上升，但是焦虑、压力、抑郁、不幸福感依然盛行，理想情绪和幸福感的关系是否正相关，以及理想情绪和实际情绪之

间的落差是否降低幸福感，文化契合是否部分决定理想情绪的内隐规范等，这些问题有所涉及，但较笼统，尽管不是本文关注重点，但是不能草率做出推论。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确实，理想情绪和幸福感之间未必是正相关。我们在引言中以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近 20 年来的上升趋势来推测一般积极情绪偏好的上升是不合理的。在修改稿中，我们对此进行了修改，彻底放弃了原来的假设，改由以现有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为依据进行推测。我们也在文章的其他部分（比如讨论）进行了相应修改。“草率做出推论”的现象不再存在了。

意见 6：高唤醒和低唤醒并不互斥，但是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高度正相关，还是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可以框架转换，这个议题讨论不够充分。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按照以往的研究，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理想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具体表现为：个体主义文化下（比如美国），个体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和排斥低唤醒积极情绪；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比如中国），个体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而排斥高唤醒积极情绪；或者说，高唤醒积极理想情绪是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而低唤醒积极理想情绪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的研究中，研究 1 和 2 都发现二者有着正向的共变关系，研究 3 中则直接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在中国文化下，二者的关系和西方文化不同。至于二者为什么会有正相关或共生、如何理解这种独特的现象，专家在问题 4 中也问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回复，这里不再重复。不过，我们认为本文结果不适合用文化框架转换的理论来解释，因为我们的研究没有对文化框架进行操纵。

意见 7：中英文摘要内容不一致，请对照修改。

回应：

谢谢专家指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对中英文摘要进行了对照和修改。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从跨时间、跨代际和跨地区三个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结果显示，中国人对高唤醒、低唤醒和无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带来的心理影响。

以下一些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修改完善：

意见 1：鉴于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积极理想情绪，建议文章题目将“理想情绪”改成“积极理想情绪”。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已将题目中的“理想情绪”改成“积极理想情绪”。

意见 2：建议加强开展中国人理想情绪变迁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面的论述。引言中的论述显得非常单薄，使得研究意义不够突出。“全球第一个考察理想情绪变迁的研究”并不足以说明本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关于研究意义，我们在讨论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不过在引言中我们的确写得相当简略。修改稿中，我们在第一段的最后增加了对研究意义的简短论述

(没有多写是因为讨论里有更多): “澄清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情绪的变化规律, 将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认识, 加深我们对理想情绪的理解, 实践上还有可以为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参考。”

意见 3: 建议文中简要介绍一下研究二和研究三的方法是如何能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意味着变迁的时间线索的。

回应:

谢谢这个很好的建议! 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不够准确所有三个研究涵盖的时间段。为慎重起见, 我们把题目中的“改革开放以来”换成了“近几十年来”。文中的相关部分也都做了相应修改。

意见 4: 综述中的部分内容需要补充实证结果的支持, 例如“已经有大量研究探讨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心理转型, 其中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 个人主义在不断上升, 集体主义在不断式微”等。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 非常正确! 除了专家提到的地方外, 我们其他几个地方也都补充了支持文献。

意见 5: 研究一中的被试量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

回应:

谢谢这个问题。评审专家 1 也有类似的问题, 见前面的回复。

意见 6: 研究二的讨论部分, “但是, 具体到每一种具体的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时间段, 研究 2 和研究 1 则不完全一致。考虑到研究一和研究二使用的设计完全不一样, 被试评估的目标群体也不同, 有些不一致应该不算意外”, 这一解释比较牵强, 说服力不足。

回应:

谢谢专家意见。确实, 我们解释过为笼统。现在我们进行了更具体的解释, 具体如下: “部分的不一致可能由多种方法性因素所致, 包括研究设计的不同、被试群体的不同、评估目标群体的不同等。比如, 就研究设计而言, 研究 1 采用的是跨时间对比设计, 得到的效应是时间效应(时间变化导致的效应)和年代效应(和出生年代相关的效应)的混合; 研究 2 采用的是跨代对比设计, 得到的效应是年代效应和年龄效应(个体发展导致的效应)的混合, 两个研究得到的效应构成成份的不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结果的不一致。”

意见 7: 表 1 是作者自己总结的还是引用的? 建议在文中叙述清楚。

回应:

感谢专家指出这一细节。表 1 引自 Tsai (2007) 的论文, 已在相应位置做了说明。

意见 8: 由于总体上集体主义在中国式微, 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偏好低唤醒的积极情绪, 但本研究一致得出中国人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也在上升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在讨论部分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中, 第一条解释由于采用的也是本研究的结果, 显得不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建议再提供其他的解释和说明。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对第一个评审专家的第 2 个评审意见的回复一样, 新的修改稿中我们采用中国文化的朴素辩证主义特点进行了解释。更多见我们对第一个审稿专家

的问题 4 的回复。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修改版本很好的回答了审稿人的修改意见，补充英文摘要之后建议发表。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的修改稿的肯定。我们已补充英文摘要。

审稿人 2 意见：

在本轮修改中作者很好地回答了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仍有如下细节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意见 1：摘要中适当增加研究问题的背景概述。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这一十分宝贵的意见。确实，我们的摘要中缺少必要的背景概述。我们在摘要中增加了简要的背景，具体如下：“理想情绪是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和文化密切相关。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人们日常体验的实际情绪的变迁，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理想情绪的变迁。”

意见 2：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积极理想情绪，建议全文尽可能统一表达。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指出这一细节。我们多遍通读全文，按照评审专家意见，除了少数涉及一般意义上的理想情绪地方用了“理想情绪”，其他所有的地方都统一用“积极理想情绪”，以和文章的主要考察对象一致。

意见 3：增进文中图表、统计符号的使用和表达的规范性，例如 4.2 研究结果部分的统计符号。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指出这一细节。修改过程中，我们多次审阅图表、统计符号和表达的规范性问题，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了修改。例如我们对 4.2 研究结果部分的统计符号的修改：“初步的相关分析显示，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显著正相关， $r(26209) = 0.38, p < 0.001$ ，和研究 1、2 预示的结果一致；二者和一般积极情绪偏好的相关分别为， $r(26209) = 0.61, p < 0.001, r(26209) = 0.55, p < 0.001$ 。”；表 5 下面的表注“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意见 4：研究三采用主体内的视角，“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村代表传统和过去，城镇代表现代和未来”，这是否有实证或者理论的支持，建议增加必要的解释。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确实，我们对这一基本假设的描述忽视了实证证据和理论支持。现在我们加入了运用该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和支持该假设的理论研究的文献：“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村代表传统和过去，城镇代表现代和未来，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人口从小规模（农村）到大规模（城市）的聚集，现代化程

度从低到高的进程(蔡华俭 等, 2023; Xin & Xin, 2017; Greenfield,2009)。”

意见 5: 另外, 研究三的结果部分, 建议对 HLM 模型增加一定的说明和解释, 便于读者理解。
回应:

我们在研究三的结果部分把具体的 HLM 模型及其解释写出来了并放在脚注中。具体内容如下: “

具体分析模型如下:

$$\text{第一层: } Y_{ij} = \beta_{0j} + \beta_{1j}(\text{SEX})_{ij} + \beta_{2j}(\text{AGE})_{ij} + \beta_{3j}(\text{SES})_{ij} + \beta_{4j}(\text{IND})_{ij} + \beta_{5j}(\text{COL})_{ij} + \beta_{6j}(\text{URBAN})_{ij} + r_{ij}$$

$$\text{第二层: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其中, Y_{ij} 表示 j 省个体 i 的积极理想情绪, β_{0j} 表示省份层面的随机截距, β_{1j} 、 β_{2j} 、 β_{3j} 、 β_{4j} 、 β_{5j} 、 β_{6j} 分别表示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城乡的效应, r_{ij} 表示个体层面残差。 γ_{00} 和 μ_{0j} 分别表示随机截距的固定部分和随机部分。”

第三轮

编委意见:

经过两轮修改, 文章质量有明显提升, 建议润色后发表。

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多遍通读全文, 按照发表的标准进行了润色。

第四轮

主编意见:

文章质量达到在学报发表的标准, 建议润色后发表。请作者考虑表 1 是否也可调整为三线表。

答: 非常感谢主编专家的意见。我们多遍通读全文, 按照发表的标准进行了润色。表 1 已调整为三线表。